

### 第三章 中共新安全觀

1991 年蘇聯解體，冷戰時代宣告結束，兩極體系瓦解，各種力量重新分化組合，世界格局處在趨向多極化的過渡期或轉型期。經濟全球化和正在興起的知識經濟以及世界各國以實力為基礎的綜合國力競爭對世界局勢產生重大影響。國際政治上的冷戰思維（圍堵與對抗）和全球經濟一體化之間交互滲透與作用，呈現出相當程度的不確定性，直接影響了國際新秩序的建構過程與內容。和平與發展依然是世界的兩大課題，但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有所抬頭，這是威脅世界和平與穩定的主要根源。<sup>1</sup>

根據中共自己的研究，冷戰時期的國際體系在東西對峙的前提下大致經歷了三大轉變：從緊密的兩極體制→三個世界→美、中（共）、蘇戰略三角。<sup>2</sup>然而，由於「蘇東坡」的風潮及蘇聯的解體，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興起的兩極體制崩潰，世界力量對比失衡，造成了國際格局另一次的巨幅轉變，世界從此走入了後冷戰時期。

後冷戰的世界局勢在「總體緩和、局部動盪」中演變，國際格局也朝向多極化態勢發展，正如中共在十四大中的政治報告中所提「兩極格局已經終結，各種力量重新分化組合，世界正朝向多極化方向發展，而新格局的形成將是長期的、複雜的過程。」<sup>3</sup>

中共認為，後冷戰國際力量對比結構其實就是美國作為唯一超強和其他幾個強國之間形成的「一超多強」的國際格局，即「單極多元」的世界格局。這種過渡性的格局具有明顯的雙重性：一方面是後冷戰時代美國仍然保持其優勢地位，使得當前的國際格局具有單極化的特點；另一方面是後冷戰各國致力於綜合國力的發展，使得本身同美國的實力差距正日益縮小，而這種多極化的走向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發展趨勢。<sup>4</sup>至 21 世紀初國際格局發展的趨勢為何呢？以大陸學者蘇格的意見作為代表。依他之見，國際格局總的來說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加緊了其領導世界的單極戰略，使多極化進程受到干擾；大國關係處於調整之中，但國際形勢發展的總趨勢仍有三個「不變」：<sup>5</sup>

- 一、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的主題。
- 二、世界多極化的歷史方向不可逆轉，經濟全球化趨勢進一步發展。
- 三、國際總體局勢趨向緩和，尚不可能出現全球性的對抗，世界大戰不致爆發。

<sup>1</sup> 唐家璇，〈為了爭取和平與發展的國際環境—新中國外交的理論與實踐〉，《瞭望新聞周刊》，第 39 期（1999 年 9 月 27 日），頁 25。

<sup>2</sup> 顧關福編著，《戰後（1945—2003）國際關係》（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 年 8 月第 2 版），頁 21—33；及 Zhao Suisheng, "Beijing's Percep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Foreign Policy Adjustment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Fall 1992), pp. 72—73.

<sup>3</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十四大以來重要文件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 7 月），頁 34。

<sup>4</sup> 陳岳，〈當前國際格局的基本特點和發展趨勢〉，《求是》，1999 年第 4 期，頁 26。

<sup>5</sup> 蘇格，〈中國國家安全環境有無變化〉，《中國評論》，2000 年 3 月號，頁 54。

國際格局的另一轉變就是大國關係的重新調整，敵我界限模糊不清，各國的對外政策均是採取確保本國國家利益為主的現實主義取向，經濟議題的地位超越軍事議題，且以經濟和科技發展為主要內容的綜合國力競爭取代傳統的軍備競賽成為各國關注的焦點。<sup>6</sup>

中共處於此新的時代，在其綜合國力仍不強的狀況下，為成爲一個有真正影響力的大國，必需有一個和平穩定安全的周邊環境，進行以經濟、科技為中心的綜合國力發展。但中共認為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遏制戰略下，會影響其綜合國力的發展。故以冷戰時期國際間已發展出的共同安全觀、合作性安全觀及綜合性安全觀等理論，綜整出符合中共本身戰略需求的新安全觀，以突破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遏制企圖。故本章內容先探討中共新安全觀的源起，再探究新安全觀的意涵，最後是在其新安全觀下中共所希望達成的國際新秩序為何？

## 第一節 新安全觀的源起

國家在界定安全範圍的過程中，必須考量國際環境中敵對或同盟及強國的權力運作，評估在最符合國家利益的情況下，來決定國家的安全戰略。進入後冷戰時期，國際環境的變遷使得國家安全概念有了不同的定義，經濟力已超越軍事力成為被視為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維持內部經濟的繁榮與穩定成長，象徵著國家能力的提升，對多數國家而言，如何防範外在的威脅對其經濟成就與發展造成破壞，成為國家安全的主軸。

鄧小平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已就依據國際局勢，研判出「在較長時間內，世界不會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sup>7</sup>冷戰結束後，世界格局趨勢走向一超多強，使中共認為國際局勢是在「大緩和、小緊張」和「總體緩和、局部動盪」中演變。<sup>8</sup>冷戰時期非友即敵的「零和」(zero-sum) 情勢漸趨緩和，全面性大戰在短期內應不致發生。<sup>9</sup>而主宰國際體系平衡的大國關係，則是由不明確走向明確，由不穩定走向穩定。<sup>10</sup>安全環境的變化改變了中共安全利益重心，經濟發展成為中共當前最重要的國家利益。

但中共並非在冷戰之初，而是到了 1997 年才正式提出「新安全觀」，強調後冷戰時期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發展的本質。呼籲世界各國勿重蹈冷戰覆轍，陷入以軍事對抗的舊思維中。因為中共要全力發展經濟建設，需要一個和平安全穩定的國際環境，而這段期間有些強國的權力運作影響到中共的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和平安全環境，造成中共國家利益的損害。因此本節探討中共新安全觀的源起背景，首先研究中共的地緣環境，其次周邊大國對中共的影響，最後是中共為突破困

<sup>6</sup> 黃碩風，《綜合國力新論—兼論新中國綜合國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 1 月)，頁 10-13。

<sup>7</sup>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0 月)，頁 126。

<sup>8</sup> 李忠誠，〈年中世界形勢交流紀要〉，《現代國際關係》，1995 年 8 期(1995 年 8 月)，頁 2。

<sup>9</sup> 于有慧，〈中共的大國外交〉，《中國大陸研究》，42 卷 3 期(民國 88 年 3 月)，頁 50。

<sup>10</sup> 韓華，〈與大國關係趨明確穩定〉，《文匯報》，1998 年 3 月 12 日，版 A4。

境，乃提出新安全觀。

## 壹、地緣環境

地緣環境是指影響國家安全的地理位置、地理特徵及與地理密切相關的國家關係等因素。<sup>11</sup>第一、中國是一個陸海大國，位於歐亞大陸的東南部，擁有廣大的陸上疆土，東臨太平洋有便利的海上通道和豐富的海洋資源。中國本應陸海併重，但由於在古代中國僅面臨來自北方遊牧民族的侵擾，所以中國曾經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採用重陸輕海的安全政策。直到 19 世紀西方大國從海上入侵中國，中國的邊防和海防遭到侵略，才開始重視來自海上的威脅。第二、中國有眾多的鄰國，陸地邊界長達 22000 多公里，相鄰國家有 15 個；海岸線也長達 18000 多公里，海上鄰國有 6 個，各國國情不同且與中國利害關係也不同，造成中國在國防防衛上很重的負擔。<sup>12</sup>

除了鄰國眾多以外，中共的安全亦受到強國在此區域競爭勢力範圍的影響。冷戰期間中共的安全主要受到美、蘇兩大勢力的影響。冷戰結束後，國際局勢形成了五大力量中心的「一超四強」的格局，除了歐盟與中共沒有直接的利害衝突外，美、日、俄均與中共有複雜的利害關係。<sup>13</sup>但俄羅斯內部問題叢生，急需整頓並發展經濟，故與中共修好，短時期內雙方將維持良好關係，相互當背依靠。反而是位於南亞的印度，積極想成為強國，與中共將產生利害衝突。以下就美、日、印三國作說明。

### 一、美國

從地理位置看，美國不能算是中國的鄰國，但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美國是中國最大的鄰國，由於美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即大力介入東亞事務。戰後中共竊據大陸後至中蘇共關係決裂前這段時間，美國將中共視為共黨集團的一份子，扶持退守台灣的國民政府並採用各種手段限制中共的發展，威脅中共的安全。70 年代起美國為藉重中共牽制蘇聯開始與中共交往，並建立官方外交關係。冷戰結束後，面對中共日漸崛起的經濟實力，美國國內又再次出現遏制中共的勢力。有人認為美國向來是根據別國的實力而不是意圖來選擇潛在敵人，儘管中共一再向美國表示中共不以美國為敵，絕對沒有傷害美國的意圖，但美國還是根據中共的實力和發展潛力把中共定位為美國敵人，並圍繞著中共周邊作出了一系列的部署，可見美國對中共安全的影響深遠。<sup>14</sup>

### 二、日本

日本是中國海上的強鄰，自清末甲午戰爭後日本即不斷的侵略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雖然戰敗，但在美國的安全保護傘下，提供了安全保障，全力發展

<sup>11</sup> 沈偉烈、陸俊元主編，《中國國家安全地理》（北京：時事出版社，2001 年 6 月），頁 33。

<sup>12</sup> 朱聽昌主編，《中國周邊安全環境與安全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 年 7 月 2 刷），頁 2-3。

<sup>13</sup> 同上註，頁 4。

<sup>14</sup> 引自海峽網，〈新形勢下的中國安全環境及對策〉，網址：<http://www.taiwan.strait.net>

經濟經濟並成爲經濟大國。在與美國簽訂的「美日安保條約」中，使日本加入美國一起構築一道對中共圍堵的封鎖線。因經濟實力的增長使日本走向政治大國的道路，並且成爲「一超四強」多元化國際戰略格局中的一員。近年，日本國內政治有右傾化的趨勢，軍國主義似乎在復興中，在冷戰後東亞地區激烈的軍備競賽和美俄逐步減少東亞駐軍的同時，日本正和中共競爭填補東亞權力真空。<sup>15</sup>

### 三、印度

1990 年代初印度調整其國家安全戰略，明確指出在 21 世紀初爭當世界一流強國的目標。爲此，軍事戰略由 1980 年代的「區域有限威懾」轉變成「區域全面威懾」。面對中共、巴基斯坦及海洋軍事強國的環境，印度要稱霸南亞，並在 2015 年前進入「世界級軍事大國」，就必須要以軍事實力爲基礎，核子力量爲後盾，威懾中共、遏制巴基斯坦並爭奪印度洋的控制權。這就要求印軍具備對國家領土、領海、領空的控制能力及在印度洋、孟加拉灣、阿拉伯海保持實力優勢，對南亞次大陸地區及附近島嶼保持戰略核威懾和常規威懾能力，在中東、東南亞和南中國海取得應急制海權實力。在此戰略定位下，印度軍方制定了「西攻、北抗、南下、東進、內穩」的全方位戰略方針。即對巴基斯坦採用積極進攻態勢，以澈底打敗巴基斯坦；對中共採取攻勢防禦戰略，保持軍事優勢，固守既得利益，穩住並遏阻中共發展海上力量和南下收復失土；積極發展海軍，最大限制性地控制印度洋；保持和加強對東南亞的影響力，並干預亞太事務。<sup>16</sup>

無論是主觀願望，還是客觀事實，周邊這三大戰略因素的發展及互動，是中共未來安全穩定不可忽視的因素。

## 貳、周邊大國對中共的影響

中共認爲當前國際社會有五大權力中心：美國、歐盟、俄羅斯、日本及中共。<sup>17</sup>就地緣關係，中共與歐盟並沒有嚴重的利益衝突，彼此間也不構成威脅，但雙方對於爭取走向世界多極化並牽制美國獨霸方面，則有共同的利益。至於中（共）俄雖領土接壤且過去是中共視爲最大之威脅者，然而現階段，俄羅斯面臨嚴重的經濟問題，比其其他國家，俄羅斯對中共的安全威脅的可能性甚小。<sup>18</sup>

就美國與日本在亞太區域的權力運作及近期美國與印度及日本與印度之間關係的發展，對中共的影響加以分析，不論從地緣、歷史、軍事、經濟或意識形態等角度來看，美、日、印度三國對中共國家安全影響的程度，都遠較俄羅斯與歐盟更爲直接。

<sup>15</sup> A. w. Grazebrook, "Regional majors growing to super power," Asia-Pacific Defense Report Yearbook 2000, (Vol. XXVI), p. 6.

<sup>16</sup> 整理自王福春、沈春蘭、陳敬華、王傳劍編著，《核陰影下的南亞》（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 年 8 月），頁 39—54。

<sup>17</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編，《中國外交 1996 年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 年），頁 1。

<sup>18</sup> 于有慧，前揭文。

## 一、美國

冷戰結束後美國也瞭解以往在軍事安全掛帥之下，經濟多被利用為政治目的的手段，但是在後冷戰時期經濟力量不論是否運用於軍事方面，其本身就直接影響政治權力的分配。<sup>19</sup>前美國總統柯林頓在 1993 年針對外交政策發表的演說中，對國家安全重新界定時，特別強調美國發揮其經濟實力與領導力對推展外交事務的重要性。<sup>20</sup>及 1994 年白宮所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強大的經濟實力與國防力量及全球的民主開放，同被列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sup>21</sup>顯現出後冷戰時期美國的全球戰略以交往為重點，將冷戰期間的敵國納入自由民主、開放經濟的西方體系中，為達成此目標，經濟政策及經濟體制在全球安全的維繫上，重要性大增。<sup>22</sup>在亞太區域，如同全球戰略一樣，美國採取的是將政治、經濟、軍事和意識形態結合為一的「交往與擴大」戰略，強調美國的領導不可缺少，惟友邦應分擔維持全球及區域安定的責任。<sup>23</sup>但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快速起飛，軍事實力露出鋒芒，美國警覺到中共有可能在未來威脅其在亞太區域及全球的領導地位。因此，除了繼續維持對日、韓、菲、泰、澳五國雙邊協防的堅定承諾，亦強化美日安全合作關係，使日本成為協助美國維持亞太安定的主要夥伴，同時繼續依據「台灣關係法」提供防衛性武器給中華民國。

一位美國高級官員曾宣稱「在對華戰略中，美國有兩種選擇，一種是遏制，一種是合作。無論是那一種選擇，美國都是贏家，然而我們還是選擇合作。」<sup>24</sup>美國安全戰略的傳統性、穩定性以及歷史實踐決定了其影響中共安全環境的根本性質。美國持續強化原有聯盟，從東北亞、東亞、東南亞三個方向加大對中共的海、陸鉗制，準備建立美日、美韓、美台三個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之防禦網，以形成對中共的空中屏障。在南亞方面，原是疏巴親印，藉 911 事件的反恐，也拉攏了巴基斯坦，明顯地將南亞政策重點指向中共，「借力取勢，以空間換時間」是美國策略的本質。<sup>25</sup>這些軍事權力的運作對中共而言，將其解讀為冷戰時期「圍堵政策」的重施，影響中共經濟發展的安全環境。

## 二、日本

1983 年中曾根康宏在其家鄉向選民發表演說時宣稱，他執政的目標是「要

<sup>19</sup> 李瓊莉，〈當前美國亞太政策中的「經濟安全」〉，《問題與研究》，36 卷 4 期（民國 86 年 4 月），頁 17。

<sup>20</sup> 參閱 Remarks by President Clinton at American University Centennial Celebration, released by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The White House.

<sup>21</sup> Bill Clinto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 statement released by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Washington, DC, July 21, 199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5, No.31, pp. 522-533.

<sup>22</sup> Alan P. Larson,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conomic and Business Affairs," *The Expanding Influence of Trade and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in U.S. Foreign Policy*, remark to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Editorial Writers, Washington, DC, Feb.14, 1997.

<sup>23</sup> 周煦，〈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台北：生智文化出版社，民國 88 年），頁 47-48。

<sup>24</sup> 梁明，〈影響中國安全的週邊因素〉，網址：

<http://www.future.china.org.tw/fcn/ideas/fcs20010202.htm>。

及《大公報》，2001 年 2 月 2 日。

<sup>25</sup> 《大公報》，2001 年 2 月 2 日。

在世界政治中加強日本的發言權，不僅增加作為經濟大國的分量，而且要增加日本作為政治大國的分量。」<sup>26</sup>中曾根康宏在這次選舉中順利當選日本首相，顯示出日本部份國民對於當時日本所處的國際地位不甚滿意，希望他能為日本爭取更多的政治影響力。其實，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人一直想「在國際社會佔有名譽地位。」<sup>27</sup>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受戰敗的結果影響，在美國的管制下，無法成爲一個正常國家，且受冷戰時期兩極格局影響，只能跟隨美國行動，無法一圓政治大國的夢。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權力重新分配，給了日本擺脫「經濟巨人，政治侏儒」的機會。1994年日本首相個人的諮詢機構「防衛問題懇談會」對當時的日本首相村山提出「日本的安全保障與防衛力量應有的情況－邁向21世紀的展望」報告書中，對於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與防衛力量提出四項基本構想：<sup>28</sup>

- (一) 追求主動的且具建設性的安全保障政策；
- (二) 建立多邊的安全保障合作；
- (三) 充實日美安全保障關係的功能；
- (四) 維持與運用具有值得信賴且高效能的防衛力量。

由以上四項構想來看，日本同中共的企圖一樣，希望在美、俄權力逐漸退出亞太區域時，能填補權力真空，在國際政治上成爲名符其實的政治大國。日本雖是中共對外借款及接受外援的主要來源，也被中共視爲發展經濟的重要助力。但到了後冷戰時期，日本積極涉入亞太區域及全球事務，在軍事權力運作上也配合美國的「交往與擴大」戰略，成爲圍堵中共的主要成員，使得中共非常憂心，但中共的崛起亦使日本產生戒心。

日本以中共實施現代化建設爲藉口，將中共視爲主要戰略對手及主要威脅。從20世紀90年代末期，日本的年度國防經費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1999年公布的「周邊事態法」已說明了日本的安全戰略由「防禦型」轉爲「進攻型」，其自衛隊今後的主要任務將是對付「周邊事態」。而所謂「周邊事態」按日本官方的解釋就是包含了中共、中共南海和台灣等地區的事件發生地。爲此，日本一改過去針對蘇聯軍事威脅的軍事部署，將主力部隊全面向西、西南移動，並決定組建對付中共海軍艦艇活動的「護島部隊」，也計劃未來配備航母。同時積極參與美國的TND計畫，其主要著眼就是借助美國取得對中共的空中封鎖，營造「既可攻擊別國，又可免遭別國攻擊」的全面戰略優勢。<sup>29</sup>

大陸學者張蘊岭即表示「由於歷史上的中日兩國關係多是建立在『一強一弱』的結構上，並未有兩強共處的經驗，因之一個強大的中國將會成爲日本邁向政治大國時的一大阻礙，與潛在的安全威脅，這種擔心將促使日本在加強本國國力的同時，亦尋求建立一個包括美國與其他亞洲國家在內之防範中共的安全網，而這

<sup>26</sup> 樊勇明、談春蘭，《日本的大國夢》（台北：五南書局，民國82年），頁14。

<sup>27</sup> 豬口孝，《經濟大國的政治運作》，賴郁君譯，（台北：月旦出版社，民國83年），頁59。

<sup>28</sup> 防衛問題懇談會（日本），〈日本的安全保障與防衛力量應有的情況－邁向21世紀的展望〉，1994年8月12日。

<sup>29</sup> 梁明，前揭文。

必然將成爲兩國關係的主要矛盾。」<sup>30</sup>一語道出這個矛盾如果引發成爲衝突，勢將對中共的經濟發展造成重大影響。這個潛在衝突在未來似乎已不可避免，但當前在國家利益整體的考量下，中共會極力防止這個衝突提早發生。

### 三、印度

印度是與中國接壤並存有領土爭端的強鄰，1962年曾爲領土爭端發生過武裝衝突，結果印度失利。故在印度的「區域全面威懾」戰略中，對中共戰略始終是重要的部分。<sup>31</sup>1998年，印度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曾公開宣稱：中共的威脅遠大於巴基斯坦，是印度最大的威脅。並以此爲據，確定以實力爲後盾，爭奪領土爲目標，以高技術戰爭爲藍圖及以對中共爲假想敵的軍事戰略構想，企圖在2005年之後能與中共打一場具有信息時代背景的核威懾條件下的高強度局部戰爭的能力。在提高海洋控制力方面，爲了防止中共南下，特別要防止中緬關係的發展，爲了進行牽制，印度海軍進入中國南海地區與菲律賓海軍進行軍事演習。<sup>32</sup>隨著中共改革開放的發展和對外貿易的大幅增加，海上運輸線關係到中共國家經濟的持續發展。1993年發生的「銀河號」事件對中共思考國家安全問題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美國於後冷戰時期在亞洲地區的「聯盟戰略」經過調整已再次的擴張，美日聯盟朝共同參戰的方向發展，干預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其次，美印、日印關係的發展從軍事交往切入，這種出於權宜之計的合作可能加速對中共的破壞性影響。再者，美日在台灣問題上的默契成爲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最大變數；美印在西藏問題上的合作也達到了默契的程度；日印合作在地緣和領土問題上構成了對中共最佳的斜線戰略牽制，日本首相森喜朗2000年8月下旬對印度訪問時直言不諱地表示「關於日印關係，只要看一眼地圖就可一目了然，這在戰略上是非常重要的。」<sup>33</sup>已明顯聯合印度遏制中共的企圖，即對稱夾擊中共的戰略構想對日印雙方顯然已了然於胸。<sup>34</sup>最後，「美日防衛新指針」和印度的海洋戰略在威脅中共經濟發展方面不謀而合，客觀上已形成鉗制中共對外經濟命脈，制約中共海洋經濟發展的力量。

### 參、中共提出新安全觀

1997年4月16日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太平洋地區論壇」會議，試圖透過學術研討會，表達中共「新安全觀」的概念及反對美、日軍事同盟所可能產生的圍堵功能。與會學者指出，當前在亞太地區仍然存在兩種安全觀念和兩種安全合作

<sup>30</sup> 張蘊嶺，〈轉變中的中、美、日關係〉，收錄於《合作還是對抗—冷戰後的中國、美國和日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9月），頁7—8。

<sup>31</sup> 王福春、沈春蘭、陳敬華、王傳劍編著，前揭書，頁273。

<sup>32</sup> 蔡拓等著，《全球問題與當代國際關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頁86。

<sup>33</sup> 張煥利，〈日本謀求對華「軟遏制」〉，《多維新聞網》，2003年11月3日，  
<http://www1.chinesenewsnet.com/gb/index.html>。

<sup>34</sup> 何新，《全球戰略問題新觀察》（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年1月），頁256。

的對立和鬥爭。一種是相互尊重主權，通過對話與協商來發展安全合作；另一種是強化軍事同盟關係，企圖建立以某大國（暗指美國）為主導的集體安全體系。後一種方式具有明顯地針對第三方（指中共）的特點，是冷戰思維在新形勢下的具體表現。從亞太地區兩個主要國家（美、日）發表的安全保障聯合宣言來看，新的安保條約不僅進一步強化了雙方的軍事同盟關係，而且將安全保障範圍擴大到整個亞太地區。在亞太地區各國普遍重視多邊安全對話與合作的情況下，繼續加強雙邊和多邊軍事同盟關係，是與亞太地區和平與發展的主流顯然是背道而馳的。除此之外，多位學者並強調中國是維護亞太地區和平與發展的重要力量，保持中共周邊安全環境的穩定，是中國最基本的利益。<sup>35</sup>

由此次會議的時間及目的來看，可以發現 1996 年 4 月美、日兩國簽署新的「安保聯合宣言」，<sup>36</sup>與 1997 年 4 月 23 日江澤民訪問俄羅斯並簽署「中俄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聯合聲明」，<sup>37</sup>向國際社會揭示「新安全觀」之間，存有微妙的因果關係。美日安保條約雖然自 1960 年修訂後未再作文字上的修正，但 1996 年重新確認的安保體制，實質上卻做了很大的轉變，象徵美日安保條約已從防衛日本的安全，擴大到維持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sup>38</sup>尤其當備受矚目的美日安保條約已在日本眾議院通過，形成法制化。根據修正過的法案，安保條約中所指的「周邊事態」是「若置之不理則有可能造成對日本武力攻擊之虞，亦即對日本和平與安全帶來重大的事態」。這種不以地理位置定義「周邊」的提法，巧妙避開了台海，甚至南海地區是否為安保條約涵蓋範圍的敏感問題。但日本政府又解釋為「一國內戰發展成爲國際問題時」也是日本周邊事態的範圍，向中共傳達了日本要成爲亞太新制衡力量的明顯企圖。<sup>39</sup>中共事後提出嚴正抗議並由媒體發表專文進行批判，但因國防力量不及美、日且要全力發展經濟，並未採用更強硬的具體行動，僅是發表「台灣問題屬於中國內政，外國勢力無權干涉」的堅定立場。因中共認爲將台灣海峽置於美日安保防衛範圍，是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的不友好行爲，如果不加以制止，則有變相鼓勵台獨的可能，對中共國家安全利益將造成嚴重傷害。

由整個事件的發展來看，中共雖不樂見日本在美國的支持下擴張其政治影響力，成爲中共在亞太區域爭霸競爭的要角。但是一個和平穩定的安全環境，卻是發展經濟提升綜合國力基礎的首要條件。特別是爲了發展中國大陸內陸經濟，中共需要日資的流入與日本 ODA 的援助。<sup>40</sup>除此之外，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議題，中共亦需要美、日的大力鼎助。所以在權衡利害之後，中共只好在行動

<sup>35</sup> 「太平洋地區論壇」第一次會議，1997 年 4 月 16 日在北京召開。

<sup>36</sup> 顧關福編著，前揭書，頁 319。

<sup>37</sup> 顧關福編著，前揭書，頁 167。

<sup>38</sup> 張隆義，〈冷戰後日本防衛政策的轉變與亞太安全〉，《問題與研究》，35 卷 7 期（民國 88 年 1 月），頁 11。

<sup>39</sup> 林吉朗、蘇進強，〈2010 年台海戰略趨勢中的美國因素：軍事政治學途徑的分析〉，《軍事社會科學學刊》，第 5 期抽印本（民國 88 年 12 月），頁 10。

<sup>40</sup> 柯玉枝，〈從國家利益看冷戰後中共與日本關係中的合作與競爭〉，《中國大陸研究》，42 卷 2 期（民國 88 年 2 月），頁 64。



上奉行「韜光養晦」政策，僅在口頭上有積極作為。近年來中共高層在不同國際場合大肆宣揚「新安全觀」的同時，也對美國將軍事力量仍視為解決國家安全問題的主要手段之觀念極盡批鬥，便是在言論上的反制。

## 第二節 新安全觀理論的意涵

新安全觀主要是相對於傳統安全觀而言的。長期以來傳統安全觀在實踐上對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發揮不小的作用，但也存在著明顯的侷限性。因此，冷戰結束以來，各國根據各自的利益提出了不同的新安全觀，一時間新安全觀內容呈現出百家爭鳴的現象。中共也根據冷戰後的世界局勢提出了自己的新安全觀，為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維護中共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和平安全環境。

安全是一個綜合概念，也是一個動態概念。其綜合性表現是一國的安全是由多種因素構成的，既有軍事因素，也有非軍事因素；其動態性表現在隨著形勢和條件的演變，對安全的威脅的認知與維護安全的手段與方式也就產生變化。安全是任何國家追求的持久目標，廣義說來，安全在客觀上是指不存在有外來的攻擊狀態或現實，在主觀上是指不存在擔心有外來攻擊的恐懼感。然而作為一個概念，在不同的年代、環境中人們對於安全的理解和看法也不盡相同。

傳統安全觀主要是奠基在現實主義理論和冷戰兩極對峙的格局，依據現實主義幾位大師如卡爾（E. H. Carr）、魏特（Martin Wight）及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看法，國家追求權力以獲得安全，當權力之間出現平衡時，國際間即可獲得和平。<sup>41</sup>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解決國際衝突唯有靠各國的「自助」（self-help），即各國依靠各國自己國家的各種資源和各種能力，主要是依靠軍事力量，來參與國際間的權力競逐或生存競爭，以獲得安全。<sup>42</sup>在冷戰期間，一種以意識形態劃分敵友並與之對抗的零和關係來分析國際安全觀念，遂成為此時期的主要安全觀，這種安全觀被稱為是「冷戰思維」，也是信奉「如果你想要擁有和平，請準備戰爭」的理念。<sup>43</sup>且認為敵對國家的實力強大是威脅本國安全的根源，而維護國家安全的基本條件是壓倒敵對國家或集團的軍事實力，故維護國家安全的方法只有兩種：一是以擴張軍備或加強軍事同盟來提高自己的軍事力量，二是採取遏制政策削減對方的力量。<sup>44</sup>換言之，傳統安全觀的「安全」是指國家防止外部軍事威脅，軍事面向是其研究的重點，而且分析層次則是以國家為主，針對國家所面臨的軍事威脅，特別是戰爭的威脅進行探究剖析。<sup>45</sup>

在冷戰期間所謂的安全研究是包含在戰略研究中。換言之，以國家與國家間的互動關係為主軸，偏重在軍事面向的研究與思考就是本時期安全的概念。因此「傳統安全觀」其內涵是軍事安全，因此「國家安全」就容易被理解為「軍事安

<sup>41</sup> 林碧炤，《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五南，民國 86 年 4 月），頁 39。

<sup>42</sup> 王逸舟著，《西方國際政治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 4 月），頁 91。

<sup>43</sup> 章一平，〈冷戰後世界的新安全觀〉，《現代國際關係》，1997 年第 2 期，頁 38。

<sup>44</sup> 閻學通，〈中國的新安全觀與安全合作構想〉，《現代國際關係》，1997 年第 11 期，頁 28。

<sup>45</sup> 莫大華，〈安全研究論戰的評析〉，《問題與研究》，37 卷 8 期（民國 87 年 8 月），頁 23。

全」，甚至被誤以為「軍事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全部，安全關係也以雙邊軍事同盟和軍事集團對立為主的表現形式。西方學者也曾指出「軍事安全」主要是圍繞在「政府有能力維持自身存在並抵禦外來的威脅」這個中心點上，但它也涉及到國家使用武力來捍衛國家和政府組織，以對抗非軍事威脅如非法移民、敵對意識形態等。<sup>46</sup>

現實主義大師摩根索指出，在無秩序的國際體系中，理性的國家機器必須憑藉權力追求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外交政策本質上就是國家安全政策，其中以軍事政策為主軸，其中包括對威脅的認知及對武力的使用時機與方式，並強調軍事方面權力的權力平衡和軍事同盟，並最大限度地發展自己的軍事優勢以克敵制勝，這是傳統安全政策與戰略的中心思想。政府之所以尋求建立永久的外交同盟或軍事聯盟，乃是認為憑一己之力不足以達成其目標，維護其利益或嚇阻明顯的威脅。在冷戰期間兩個最大的軍事聯盟就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與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 Warsaw Pact），它們發揮集體的力量，維護個別或集體的利益，其精神與權力平衡相同，就是要建立一套制度化的機制來約束各國使用權力。在 1945 年至 1991 年的冷戰期間，美國一共建立了八個集體（安全）防衛性質的軍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美澳紐公約（Australia-New Zealand-United States, ANZUS）、美菲條約（US-Philippines）、東南亞公約組織（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中美共同防禦條約（US-Republic of China）、美日安保條約（US-Japan Treaty）、美韓條約（US-Republic of Korea）及西半球公約（the Rio Pact），除此之外在中東地區還有中部公約組織（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蘇聯則有三個：華沙公約組織、中（共）蘇友好同盟防禦條約及朝蘇軍事同盟。<sup>47</sup>美蘇出於爭奪世界霸權的需要，將軍備競賽和軍事同盟視為角力競技場，且憑藉著強大的核武威懾力量，在「恐怖平衡」下使東西方維持和平狀態。

冷戰結束後已經過了十幾年，但軍事安全的重要性並未因此而走向式微，受到現實主義者所主張的「自助」的影響，各國以「質量建軍」為國防建設的基本原則，其軍備發展近年來可說有增無減，以 1990 年美國國務院報告「全球軍事支出可能止跌回升」，報告中指出，全球軍事支出在冷戰後遽降，但可能從 1996 年起止跌回升，開發中國家的軍事支出自 1995 年以來即呈成長之勢，而已開發國家的軍事支出可能已經止跌回升。以東亞為例，該地區的軍事支出的比率，從 9% 大幅增加至 21%。<sup>48</sup>但從表 3 - 1 中看出，各國軍費的支出受到經濟安全與發展的箝制，也就是說各國的經濟發展對其軍備現代化程度影響甚大。另一方面，由於國際局勢的和緩，各國不需再將大部份資源耗費在軍事力量組建上。但

<sup>46</sup> Barry Buzan, Ole Wa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ondon: Rienner Publishers, 1997), p. 50.

<sup>47</sup> Alvin Z. Rubinstein, "Alliances and Strategy: Rethinking Security," *World Affairs*, Vol. 3, No. 3 (April/June 1999), pp. 59-62.

<sup>48</sup> 美國國務院報告，〈全球軍事支出可能止跌回升〉，《中國時報》，民國 89 年年 8 月 23 日，版 13。

東亞及南亞地區在冷戰結束後成為世界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地區，所以軍費支出成長也是最高的地區。因此經濟之成長而帶動軍事現代化，故中共要全力發展經濟建設，期能獲致較多經費從事國防現代化工作。

表 3-1：1990—1999 年世界各地區的軍費支出表 (單位：10 億美元)

年份 區域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10 年間的 變化比率 (%)
非洲	11.9	11.1	9.9	9.9	10.0	9.4	8.9	9.3	9.5	10.6	-11
北非	2.4	2.5	2.7	2.9	3.4	3.1	3.2	3.5	3.7		+54
撒哈拉以南	9.5	8.7	7.2	7.0	6.6	6.3	5.8	5.8	5.8	6.6	-30
美洲	386	339	359	343	326	312	294	294	287	294	-24
北美	369	325	343	325	308	290	274	272	266	269	-27
中美	0.8	0.6	0.6	0.5	0.5	0.5	0.5	0.4			-50
南美	16.3	13.5	15.6	17.8	17.5	21.3	19.5	22.1			+36
亞洲與大洋洲	115	118	124	126	127	130	134	137	137	139	+21
中亞			1.1	1.4	0.9	1.0	1.0	1.2			+9
東亞	95.1	97.9	103	104	105	108	111	114	113	114	+20
南亞	11.6	11.4	11.4	12.4	12.3	12.8	13.0	13.4	13.6	14.5	+25
大洋洲	8.2	8.2	8.6	8.9	8.8	8.5	8.4	8.6	8.9	9.3	+13
中東	51.7	69.1	50.0	48.0	47.2	44.9	45.5	50.3	49.5	49.4	-5
歐洲	442		275	260	253	228	226	227	221	226	-49
東歐	213		59.9	52.6	52.0	36.8	34.3	36.1	29.2	33.0	-85
獨聯體歐洲部份	0		49.3	43.6	43.2	28.0	25.6	27.3	20.4	24.6	-50
西歐	229	225	215	207	201	192	192	191	192	194	-16
世界	1007		818	787	763	724	708	718	704	719	-28.6
變化比率 (%)	4.6		18.8	3.8	3.0	5.1	2.2	1.4	1.9	2.1	3.7

資料來源：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室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http://projects.sipri.se/milex>  
空白格為原資料缺。

## 壹、新安全觀產生的客觀條件

依中共學術界之研究，後冷戰的國際局勢變化，對原有的傳統安全觀是以軍事安全為國家安全之之核心的觀念已產生衝擊，新的條件如科技的精進、經貿的

區域化及全球化、社會價值的多元化，已蘊釀出新的安全觀念。<sup>49</sup>

### 一、科技革命是新安全觀產生的根本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科技的發展，高科技及其衍生的產業已不僅可以促進生產力大幅提升，而且成了軍事上的威懾力和政治上的影響力，並成爲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是否強大的標誌。對於科學技術的發展，常聽學者感嘆的說「20年後人們即將擁有的知識中，90%目前還沒有被發現或創造出來。」<sup>50</sup>「人類知識的增長，19世紀是每50年增加一倍，20世紀中葉是每10年增加一倍，當前則是每3至5年增加一倍。近30年來，人類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比過去兩千年的總和還要多。全世界用於科學研究的經費，20世紀60年代末比20世紀初增長了400倍，現在已達到每年4000億美元，估計未來100年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人數將佔世界總人口20%。」<sup>50</sup>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縮短了世界各國之間的時空距離，使世界各地和國家事務的公開性、透明度及關聯性日益加強，安全具有了更廣泛的普遍性和相關性，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安全需要以他國及其他地區的安全爲條件，離開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安全與合作，很難獲得真正的安全。安全只能是各國、各地區的普遍安全。在考慮安全問題時，要充分考慮國家與地區安全、國際安全之間的關係。

### 二、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和區域經濟集團化的趨勢催生了新的安全觀

交通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促使經濟日益全球化，經濟的全球化是經濟一體化逐步發展的產物，從其發展過程來看，世界經濟經過國際化、區域一體化到全球化，最後發展爲全球經濟一體化。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這些區域性經濟集團之間以及區域性經濟集團內部，既存在合作也存在競爭。因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損俱損」的情況到處可見。這就是說，每個國家都將面臨來自各個方向的安全威脅。日愈頻繁的跨國經濟交流的發展，全球信息時代的到來和世界各國各民族文化價值觀的碰撞和交融，全球化時代的國際關係形成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等各種關係的複雜融合使國家安全發生重大的變化。這種一體化日益把各國納入它的體系，使他們各自的安全必須依賴於其他國家，而相互依存又帶來了全球性問題的出現，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單獨解決這些問題，世界各國必須進行廣泛的合作以求共同繁榮。

### 三、後冷戰世界面臨著一系列多元、複雜而又不爲人們熟悉的安全議題迫使全人類確立新的共同安全觀。

當今世界，從民族衝突、邊界爭端到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從人口激增、糧食問題到愛滋病的漫延；從全球貧困到地球生態系統的破壞；從毒品走私到恐怖主義活動的猖獗，凡此種種無不威脅到人類的持續生存和發展。這些安全議題的出現客觀上需要人們以全新的視角和方法來認識和對待它們，明確指出全人類某種共同安全觀確實已屬關係人類整體生存的國際事務。

<sup>49</sup> 整理自 劉凱軍，〈新安全觀與中國國家安全〉，（中共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2年5月），頁7-9。

<sup>50</sup> 《中國經濟時報》，2000年6月12日。

#### 四、文化的多樣性和多元化要求各國承認安全觀上的多樣性和多元化。

文化的多樣性和多元化是人類歷史從來就是固有的現象。在冷戰時期，由於戰爭的威脅存在，使得文化的多樣性和多元化處在不顯著的地位。冷戰結束後，大國爭霸現象消失，而地區衝突、宗教衝突、種族衝突、文化衝突卻日益顯露出來，使文化的多樣性和多元化得到充分的表現。其中，東方文化、伊斯蘭文化、基督教文化更成爲文化的多樣性和多元化的主要載體，那種強行追求文化的單一性和單一化將必然會帶給世界極大的不安全、不穩定。同樣，文化的多樣性和多元化表現在安全觀的領域，就是多種安全觀念的勃興。

### 貳、當前國際上幾種新安全觀的內容

國家安全所發生的新變化、新特徵，促進了各國安全觀的新發展，安全觀朝向多元化方向深化，當今世界既有「冷戰思維」的安全觀，也有力求適應形勢發展不斷更新的「共同安全」、「和作安全」、「綜合安全」等安全觀。<sup>51</sup>

#### 一、「冷戰思維」的安全觀

一種以意識形態劃分敵友和以對抗性的零和關係分析國際安全的觀念是冷戰時期的主要安全觀，它被稱之爲「冷戰思維」。<sup>52</sup>以此來建構國際安全非但沒有帶給人類持久的和平與安全，反而使世界在冷戰陰霾中持續近半個世紀之久。冷戰結束後，這種思維仍繼續存在。冷戰思維是因兩極對抗而形成的一種傳統安全觀。它除具有傳統安全觀的一般特徵外，還有自己獨特的時代特徵。這些特徵表現在：意識形態因素在國家安全觀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霸權與均勢並存，均勢佔主導地位；衝突與合作並存，衝突是主軸。迄 21 世紀初冷戰思維在世界一些國家的安全觀中仍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只是在新形勢下作了一些調整。這些調整主要體現在：陣營對抗的色彩減弱，霸權與均勢雖然依然並存，但獨霸色彩更濃；在安全戰略的運用上，既注重對抗和遏制等強制手段的運用（如美日軍事同盟的加強等），也注意採用合作和接觸等相對溫和的手段（如美國利用亞太經合組織、東盟區域論壇等）。但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維護和擴充本國的安全利益。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在冷戰結束後單邊主義嚴重膨脹，如不經聯合國授權武力打擊伊拉克和動用北約軍事力量對主權國家南斯拉夫狂轟濫炸，「911 事件」後更試圖主導國際反恐聯盟，制定出全球反恐遊戲規則，這種典型的冷戰思維是與時代的發展背道而馳，是與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格格不入，將危害地區乃至世界的安全與穩定。事實已經充分證明，「冷戰時期以軍事聯盟爲基礎，以加強軍備爲手段的安全觀和體制已被證明不能營造和平。在新形勢下，擴大軍事集團，加強軍事同盟更是有違時代的潮流。」<sup>53</sup>

<sup>51</sup> 整理自 劉凱軍，前揭文，頁 9—12。及 王逸舟，〈論綜合安全〉，《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1998 年第 6 期，頁 32—36。

<sup>52</sup> 閻學通，前揭文。

<sup>53</sup> 錢其琛，〈在第 52 屆聯合國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97 年 9 月 25 日。

隨著後冷戰世界情勢的變化和發展，傳統安全觀在現實中面臨內在和外在的挑戰：<sup>54</sup>內在挑戰來自其邏輯上的矛盾，傳統安全觀過於注重軍事實力在確保安全中的作用，而在現實的國家之間的關係中，一個國家擴充軍備的行為往往會引起他國的警惕，也採取相對應的措施，避免在安全環境中處於被動的地位，如此循環返復而又呈螺旋上升的軍備競賽行為，既使雙方永無安全之日，也使國際政治環境處於更加危險和不安全的狀態中。冷戰時期，美蘇競相擴充軍備，展開瘋狂的軍備競賽，特別是核子武器競賽，企圖以軍事力量壓倒對方，取得優勢的地位。結果卻是雙方的軍備水準不斷的提高，但雙方始終沒有安全感，長期處於戰爭的恐怖之下，即所謂的「安全困境」。

外在的挑戰是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發展、經濟的全球化趨向以及日愈加深的全球相互依存等因素。冷戰後世界更是面臨著一系列多元、複雜而又不為人們熟悉的安全議題，從民族衝突、邊界爭端到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從人口數量激增所引發的糧食問題到愛滋病的漫延，從全球貧困到地球生態系統的破壞，從毒品走私到恐怖主義活動的猖獗，凡此種種無不威脅到人類的持續生存和發展。這些安全議題的出現客觀上需要人們以全新的視野和方法來認識和對待它們。

## 二、「共同安全」觀

「共同安全」理念的構想最早出現在歐洲，1982年當時的瑞典首相奧洛夫·帕爾梅主持的非政府組織「裁軍與安全問題獨立委員會」，就全球安全提出一份報告，題為「共同安全：生存的藍圖」。該報告第一次就共同安全要達成的目標、實現的途徑、應遵循的原則作了比較系統的分析，在國際社會產生較大影響。<sup>55</sup>1983年聯合國大會決定專案編組一個政府間的研究小組研究「共同安全」，最後發表了「安全概念」的研究報告，使共同安全理念有了新的發展。

共同安全觀與傳統安全觀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它以國家間的共同安全取代單一國家的安全。共同安全觀認為，在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時代，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單純依靠自己的行動獲得真正的安全，安全只能是相互的，安全不是「零和遊戲」。因此共同安全觀主張，安全問題涉及所有國家，各國都有權並有責任參與尋求建設性的解決安全問題，所有國家都有獲得安全的權力；安全的內涵擴大，應該從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地理和技術因素的日益增長等方面的相互作用的綜合角度來分析安全問題。世界雖因種族、語言、歷史、習慣、意識形態、政治體制、社會經濟制度及發展程度的不同而呈現出多樣性，但不應因此阻礙為尋求和平與安全所進行的各種安全合作。其次，軍事手段不是實現安全的唯一手段，也不是最好的方式。共同安全觀認為，在選擇實現安全的手段時，一般應遵循兩個基本原則，即實現安全的國際手段要高於國家手段；和平的手段要高於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的手段，依靠軍備競賽和軍事對抗很難實現本國安全。第三主張通過軍備控制，展開多邊合作及促進聯合國的安全職能等來實現共同安全，認為以威懾觀念為基礎的戰略思想和聯盟體系只會引發軍備競賽，而形成「安全困

<sup>54</sup> 章一平，前揭文，頁38。

<sup>55</sup> 資中筠，《國際政治理論探索在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170。

境」。從總體來看，共同安全觀是對傳統安全觀的摒棄，是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但是它尚有許多不足，雖然它也提到經濟等因素對安全有一定影響，但它在考察安全問題時，仍舊侷限在軍事安全領域，沒有觀察軍事安全與其他安全的關係，實現安全的途徑也主要著眼於軍備控制和裁軍等軍事領域。

共同安全觀對各國的安全觀也產生了一些影響，澳大利亞政府倡議在亞洲建立一個像北約的亞洲安全理事會，加拿大政府也極力推崇在亞洲建立一個「太平洋模式」的亞洲安全理事會。然而，共同安全觀雖然對亞洲各國的安全觀產生一些影響，但這些影響是有限的。共同安全觀之所以在亞洲沒有大的發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綜合來說主要是：就核子對抗的規模和程度而言，亞洲的規模比歐洲小，對抗不如歐洲激烈，核武安全的緊迫性不如歐洲；亞洲各國對建立具有一定約束力的安全協調機制尚缺乏應有的準備；亞洲各國在社會制度、發展程度、文化等方面存有很大的差異，多樣性的亞洲要統一在單一性的安全機制下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調適。

### 三、「綜合安全」觀

綜合安全觀是日本在 70 年代末最先提出的一種安全觀，其核心觀念是「必須完整地考慮安全，包括危及國家利益的軍事威脅和非軍事威脅，並保證國家的一切資源可用於促進國家安全。」日本政府在一份「國家綜合安全報告」中，第一次系統的闡述了綜合安全觀。<sup>56</sup>日本政府之所以提倡綜合安全觀是因為日本是一個資源貧乏且依賴貿易型的國家，經濟安全顯得非常重要，同時受戰後「和平憲法」的約束，為了扭轉其在傳統的軍事安全中的不利地位，通過突顯其他安全的地位與作用，抬高日本的國際地位，同時弱化其謀求政治及軍事大國所引起的反彈。

最先接受綜合安全觀的東盟國家，東盟國家由於經濟實力弱，民族及宗教衝突激烈，政治不穩定，因此十分認同綜合安全觀念。同時，東盟國家認為通過推行綜合安全觀可以開拓東盟國家活動的舞台，提升東盟在國際社會，特別在亞太地區的地位。冷戰結束後，綜合安全觀在東盟有了一些新的變化，其外向性進一步的加強，東盟各國對展開多邊安全對話的興趣日漸濃厚。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專門成立了綜合與合作安全工作組，對綜合安全進行專題探討，並提出了綜合安全若干原則：即綜合原則、相互依存原則、合作及共同安全原則、自力更生原則、包容性原則、和平接觸原則及好公民原則，它還依據這些原則，提出一系列加強綜合安全的措施。

### 四、「合作安全」觀

合作安全顧名思義就是通過合作謀求安全，這是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於 1988 年提出的概念。這一理論強調安全應是一種群體的行動，應通過地區內所有國家間的合作而達成。1990 年 9 月加拿大外長克拉克在聯合國大會發言中指出，亞太國家應根據冷戰結束和亞太地區安全所出現的新情況，重新定義安全的概念，追求合作安全。克拉克說「合作安全就是在互信基礎上展開多邊合作，取代以權

<sup>56</sup> 吳鵬，〈試論我國亞太地區安全觀及發展〉，《世界政治與經濟》，1999 年第 6 期。

力平衡為基礎的冷戰安全觀。」所以，克拉克倡議北太平洋的美國、蘇聯、中共、韓國、朝鮮、日本和加拿大等幾個國家進行「北太平洋合作安全對話」，這一提議得到了有關各國不同程度的響應。<sup>57</sup>

合作安全觀經過幾年的發展，內容日益豐富，形成了自身的特點：一是成員的包容性，合作不僅是指觀點一致的行爲主體之間的合作，而且也包括觀點不一致行爲主體的合作，也就是說參與安全合作者，不論其政治制度的性質如何，不論其在國際機構中的地位與作用爲何，也不論其是否參加了其他多邊論壇，都可參加安全合作。同時，在承認國家是國際事務的主體，也承認非國家行爲主體如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等國際事務中的作用。二是內容的廣泛性，合作安全吸收了綜合安全觀的一些思想，大大擴充了安全合作的內涵，除強調要探討軍事合作的途徑外，對環境惡化、人口問題、跨國犯罪等全球性問題也給予足夠的關注，將它們納入安全合作的議題。三是模式的多樣性，合作安全觀的倡導者認爲，合作安全可以是官方的和非官方的、雙邊的和多邊的，而且不一定要建立一個有約束力的正式機制，關鍵在於培養一種對話的習慣，增加透明度及相互信任。總之合作安全的核心是「合作」，它強調互信而非遏制、強調包容而非排他、強調多邊與雙邊而非單邊，強調非軍事方式而不是軍事方式、強調國家是國際安全體系的主體，同時也不忽視非國家行爲主體在國際安全體系中的作用、強調對話但也不反對建立正式的安全機制。

上述幾種安全觀念都是爲適應時代發展需要而提出的，具有一定的意義。但它們也存在一些不足處。首先，以上幾種新安全觀沒有考慮到傳統安全觀中合理和仍然適用的因素，沒有解決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文化傳統不同的國家之間的問題，如何實現和平共處、共同安全等現實問題；沒有充分考慮到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之間的相互關係，企圖以自己提出的安全觀簡易地取代傳統安全觀。其次，上述幾種安全觀不同程度地鼓吹了國際安全高於國家安全的觀點，在當今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依然存在的情況下，這就爲西方國家藉口國際安全干涉別國內政提供了理論基礎。其三，以上幾種安全觀只是少數國家的主張，主要代表西方發達國家的利益，無法解決發展程度不同國家之間，如何實現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等迫切問題，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由於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居於劣勢，其國家安全不可能得到有效的維護。因而對上述幾種安全觀所暴露的問題在建構新型安全觀時，是必須要予以特別重視。

### 參、中共新安全觀內容

建構符合時代潮流的新安全觀，需以當今世界的時代特徵爲依據，既要充分評估區域化、全球化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產生的影響。且國際的安全形勢逐漸走向緩和，但又要認識到當前的國際安全環境仍舊沒有擺脫傳統安全觀的束縛，以國

---

<sup>57</sup> 吳鵬，前揭文。



家安全為主導的安全模式仍舊佔據著主導地位。中共認為冷戰後世界和亞太地區面臨的一系列多元、複雜的安全議題有以下幾項：一、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所帶來的安全威脅和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所引發的矛盾。二、地球生態系統的破壞、民族衝突、邊境爭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三、毒品走私和恐怖主義活動猖獗等問題。所有這些問題無不威脅到國家與全體人類的安全。因此，中共要持續發展經濟，需要一個和平、安全、穩定、繁榮的國際環境，但中共認為現代國際關係中的各種安全觀，無法完全符合中共所需，故中共要建構符合本身需求的安全觀（稱為中共新安全觀，簡稱新安全觀），並企圖擴大此新安全觀在地區安全、國際安全中的影響力。依中共學者之研究，新安全觀的內容是逐漸充實，以下綜整他們的論述。<sup>58</sup>

中共在國家安全中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戰略能力小於國防邊界，戰略上的行動自由受到嚴重限制。一方面是國家層次上，美國單極霸權的追求對中共的遏制；另一方面是資本主義體系層次上的西方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優勢的無形壓制。正因為如此，在吸取和借鑒其他安全觀的合理觀點之基礎上，中共於 90 年代中後期逐漸形成了一種新安全觀。此新安全觀的主要思維是依據下列事項：一是國際安全所面臨的威脅取決於國家和集團間的政治關係而非實力差距，而政治關係又主要取決於意圖。二是國家安全的基礎是共同安全利益，是相互信任和互利基礎上的經濟合作與共同發展，而非實力優勢、軍事同盟或社會制度及價值觀的一致。三是各國拋棄冷戰思維，尊重主權原則，尊重多樣性，不謀求霸權和不針對第三方等是新安全觀堅持的原則。

1997 年 4 月 23 日江澤民在俄羅斯聯邦國家杜馬<sup>59</sup>發表的「為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而共同努力」的演講中，正式提出了建立「新安全觀」的主張。江澤民指出「不同於冷戰思維的一種新安全觀，對於增進國與國之間的友好與信任，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將會提供有益的啓示和開闢新的途徑。」這一思想在中俄雙方發表的「中俄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中得到確認。聲明中指出：必須「確立新具有普遍意義的安全觀，必須摒棄『冷戰思維』。」同年 7 月和 12 月錢其琛在東盟成立 30 週年和第 52 屆聯合國大會發言中，代表中共政府對新安全觀作了進一步的說明。1999 年 3 月 26 日江澤民在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上的講話中，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中共新安全觀。<sup>60</sup>江澤民強調「以軍事聯盟為基礎，以加強軍備為手段的舊安全觀，無助於保障國際安全，更不能營造世界的持久和平。」這就要求必須建立適應時代需要的新安全觀，並積極探索維護和平與安全的新途徑。新安全觀的核心，應該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各

<sup>58</sup> 整理自 劉凱軍，前揭文，頁 12—14。及 侯保龍，〈21 世紀中國亞太安全戰略研究〉，（中共蘇州大學，碩士論文，2002 年 5 月），頁 6—10。

<sup>59</sup> 國家杜馬：俄羅斯 1993 年憲法規定，俄羅斯聯邦會議為俄羅斯國會，區分聯邦委員會和國家杜馬兩院；聯邦委員會由俄羅斯聯邦每個主體各派一名國家權力機關代表和一名國家執行權力機關代表組成；國家杜馬由 450 名代表組成，每四年選舉一次。國家杜馬主要職權為法律審定權及預算權。餘詳細內容請參閱葉自成著，《俄羅斯政府與政治》（台北：揚智文化，1997 年 8 月），頁 204—206。

<sup>60</sup> 《華聲報》，1999 年 3 月 27 日。

國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及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以及其他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是維護和平的政治基礎。互利合作、共同繁榮，是維護和平的經濟保障。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對話、協商與談判，是解決爭端、維護和平的正確途徑。只有建立新的安全觀和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才能從根本上促進裁軍進程的健康發展，使世界和平與國家安全得到保障。

在中共提出的新安全觀中，互信、互利、平等、合作是相互聯繫與統一的。互信是新安全觀的前提，互利是新安全觀的物質基礎，平等是新安全觀的靈魂，是政治基礎，合作是實現新安全觀的現實途徑。冷戰結束後，世界的多極化趨勢持續發展，各種力量出現新的分化與組合，相互之間的信任是各國建立和平友好關係的前提。要實現真正的相互信任，就必須堅持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奉行和平的對外政策。世界是一個相互連繫、相互依存的一個整體，政治、經濟上的互利、互惠可以加強國與國之間的依賴度，為國際安全提供共同的利益基礎。政治上的互利合作主要是建立公正、合理的政治新秩序，逐步消除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實現共同安全。經濟上的互利合作主要是通過建立公正、合理的經濟新秩序，逐步消除貿易交往中的不平等現象和歧視政策，縮小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實現共同繁榮，並促進共同安全。世界各國在維護政治安全、經濟安全和軍事安全等方面的共同利益，為擴大世界各國在安全方面的合作提供了堅實的利益基礎。平等是國與國之間發展關係的前提條件，每個國家有權維護自己平等權利，也有義務承認和尊重別國的平等權利，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的平等一員，各國人民有權根據本國的國情和自己的意願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不能強求一律，強加於人。世界各國應通過對話與合作增進相互瞭解與信任，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堅決反對各國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來解決利益糾紛。合作的方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但從總體上看，必須遵循平等參與、求同存異、協商一致、循序漸進的原則，不斷擴充合作領域，不斷探索合作的新模式。

2002年11月8日中國共產黨召開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十六大），總書記江澤民的工作報告中，有關外交工作方面的內容摘要如下：「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始終把國家的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關係，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按照冷靜觀察、沈著應對的方針和相互尊重、求同存異的精神處理國際事務，尊重世界多樣性，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和良好的周邊環境。」<sup>61</sup>

從中共學者的研究及中共十六大工作報告，中共新安全觀內容核心為「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及和平共處五原則。雖然其內容仍在進一步發展中，但已得到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不同程度的認同與支持。同時中共也意識到它是中共的主觀願望，而非國際關係中的現實狀況。由於在世界事務中大國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中共的新安全觀要得到大國的認可及支持才有可能發揮作用。但從目前的情況看來，離中共的理想目標還有很大的差距，但對維護與增進中共國

<sup>61</sup> 《人民日報》，2002年11月9日，版2。

家安全確有極大的作用。

## 肆、新安全觀意涵

綜合上述中共新安全觀內容，再佐證下列中共領導說法人及學者看法：

- 一、錢其琛：1997年12月16日在東盟地區論壇私營部門慶祝東盟成立三十週年大會上，發表了題為「發展合作才能獲得和平與繁榮」的講話，從政治、經濟與軍事三個面向來闡述中共的「新安全觀」與維護和平的途徑，這是中共領導人首次公開詮釋「新安全觀」的內涵。
- 二、江澤民：1999年3月26日，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在瑞士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上發表談話，首次正式提出和闡述中共的「新安全觀」；另外，在2000年9月6日的聯合國千禧年高峰會上發表演說時他又提到拋棄冷戰思維的「新安全觀」。綜合兩次談話內容：營造共同安全是防止衝突和戰爭的可靠前提。新安全觀的核心，應該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各國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其他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是維護和平的政治基礎。互利合作、共同繁榮，是維護和平經濟保障。只有建立新的安全觀和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才能從根本上促進裁軍進程的健康發展，使世界和平與國際安全獲得保障。<sup>62</sup>
- 三、遲浩田：中共前國防部部長遲浩田2000年9月7日於東盟地區論壇第四屆國防院校校長會議發展開幕式致詞時指出「我們主張各國應確立『平等、對話、互信、合作』的新安全觀，切實做到相互尊重而不以強凌弱，協調一致而不強加於人，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彼此間的爭議。」<sup>63</sup>
- 四、大陸學者的看法：<sup>64</sup>
  - (一) 新安全觀認為國際安全所面臨的威脅的威嚇取決於一國是否有稱霸、擴張、侵略及干涉他國事務的動機，而非國家間的實力差距。
  - (二) 國際安全的基礎是共同的安全利益、相互信任和經濟發展，而非實力優勢、軍事同盟和一致的政治制度。
  - (三) 中國的新安全觀是一種綜合安全觀，在注重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的同時，看到、接受和注重政治和社會穩定、經濟安全、能源、環保等新型安全問題。在地區和國際安全上，中國主張：在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國際關係；在經濟安全上，中國認為經濟安全是穩定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份，主張維護正常和良好的經濟、金融秩序，不僅要有完善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和健全的金融體系，而且要加強地區和世界的金融合作，共同

<sup>62</sup> 依然，〈江澤民的「新安全觀」透視〉，《鏡報月刊》，1995年5月號，頁24。

〈江澤民在聯合國千禧年高峰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0年9月7日，版1。

<sup>63</sup> 〈遲浩田倡新安全觀〉，《大公報》，2000年9月7日，版A2。

<sup>64</sup> 閻學通，《中國與亞太安全：冷戰後亞太國家的安全戰略走向》（北京：時事出版社，1999年1月），頁20—24；及楚樹龍、彭春艷，〈冷戰後國際安全理論的發展〉，《現代國際關係》，1999年第4期，頁31。

防範國際游資的投機衝擊，創造穩定、安全的外部經濟環境。安全應當依靠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的聯繫，且對話與合作是促進地區和平與發展的主要支柱。

中共認為世界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變化的世界需要摒棄冷戰思維，建立適應時代需要的「新安全觀」和新的國際政治、經濟安全秩序。<sup>65</sup>而中共的「新安全觀」無疑地就是最佳典範。它是在原有安全觀基礎上的擴展，且符合時代發展的趨勢與潮流，主要表現在：<sup>66</sup>

- 一、把和平共處五原則，以及其他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作為維護和平的政治基礎，力求共同安全；既重視本國的安全利益，又充尊重其他國家的安全利益，力求實現國家安全利益與地區安全利益、國際安全利益的有機統一。
- 二、把互利合作作為維護安全的經濟基礎，力求共同繁榮。
- 三、在國家安全目標的選擇上，主張建立平等合作、共同安全的新型國際政治關係，互補互利、共同發展的新型國際經濟關係。
- 四、在強調綜合安全的同時，全面衡量各安全要素在國家安全系統中不同地位和作用，確立了經濟安全是基礎、政治安全是根本、軍事安全是保障、科技安全是源泉、文化安全是靈魂的辯證、全面的安全觀念，並使各安全要素互相促進。
- 五、力求實現生存權與發展權的統一。
- 六、新安全觀的核心，應該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

諸觀「新安全觀」的內涵與特點，吾人可發現中共「新安全觀」不僅是其對國際局勢的變化進行客觀研究的結果，也是對中共政權本身的歷史經驗進行認真總結的結論，主要反映在：

- 一、對待不同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問題上，能秉持各界共處五原則和堅持以共同的戰略利益為主要考量，不因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歧異而影響了同他國關係的發展。
- 二、關於軍事同盟的作用上，有鑒於以往兩大軍事集團是在意識形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但集團成員間常有意見不一致或利益遭犧牲的情況發生，故中共從1980年代起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明確宣佈不同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結盟，不參加任何軍事集團。
- 三、冷戰期間軍事安全成為各國安全觀的重心，故軍備競賽成為東西兩大集團較量的角力場，經濟發展成為軍事安全的附屬品；但在國際局勢和緩、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以及綜合國力競賽如火如荼地展開的情況下，軍事安全和軍備建設應為經濟發展服務，為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也唯有經濟搞上去了，軍事現代化才有可靠和堅實的基礎。

<sup>65</sup> 〈「2000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文匯報》，2000年10月17日，版C12。

<sup>66</sup> 朱陽明主編，《2000—2001年戰略評估》（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7月），頁136。

中共的「新安全觀」是一種在重視軍事安全的前提下，開始重視包括經濟安全、政治安全、社會安全、信息安全和生態安全在內的綜合安全觀，反映了冷戰後時期各國間逐步提高的互賴性與安全議題的共通性，促使各國必須一致來解決複雜安全的問題，同時也透露出中共對和平的企求，傾向於透過對話、協商、合作、信任的和平方式來擴大共同利益，並藉此突顯冷戰思維下的軍事安全各軍事同盟所帶來的敵對性。<sup>67</sup>所以說中共的「新安全觀」就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是屬於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思維混合下的產物。<sup>68</sup>另外，在「新安全觀」指導下的中共外交和安全戰略也代表著一種國家主義和國際主義交互影響下的產物，是受到民族光榮、國家統一與恢復中國大國地位理想的驅使等內在因素，<sup>69</sup>以及外在因素的刺激，特別是冷戰兩極體系的解體，給中共帶來極大的衝擊；蘇聯的崩潰，並非由於戰爭的失敗，而是歸咎於因經濟蕭條所引發的內部政治動盪，因此對國家內部政治和經濟局勢的「穩定與發展」問題之關切，遂成爲界定國家國家安全時所不可忽視的因素。囿於傳統現實主義的思維，中共也強調需從傳統主權國家的觀點來檢視全球性議題，並且應透過雙邊對話和協商來處理，而不是透過多邊或集體安全機制來解決，這種心態也反映在其對安全合作的態度上。<sup>70</sup>

### 第三節 新安全觀下的國際新秩序

1988年12月鄧小平會見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時說：「當前世界上主要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發展問題。和平是有希望的，發展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人們都在講南北問題很突出，我看這個問題就是發展問題。」同時又說：「世界總的局勢在變，各國都在考慮相應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國際秩序。霸權主義、集團政治或條約組織是行不通的，那麼應當用什麼原則指導來指導新的國際關係呢？最近，我同一些外國領導人和朋友都談到這個問題。世界上現在有兩件事情要同時做，一個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一個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sup>71</sup>90年代初隨著東歐劇變及蘇聯解體，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冷戰」時代

<sup>67</sup> 邱昭憲，〈冷戰後中共的安全觀與東亞安全合作〉（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8年7月），頁48。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亞太安全論文彙輯（1）》（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86年），頁17。

<sup>68</sup> 新現實主義與中共「新安全觀」觀點相同處有：（1）權力是實現國家安全與目標的手段，而此處的權力是指國家的綜合國力。（2）外交與內政相連，注重經濟活動對國家外交政策的影響。（3）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中，國與國關係的主要形式是衝突與競爭，但當兩國具有共同利益時，他們是可以合作的。（4）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參與共中的各國既可能獲利亦可能受害。新自由主義與中共「新安全觀」觀點相同處有：（1）軍事力量的作用減弱。（2）經濟利益與國家安全同爲國家追求的目標。

<sup>69</sup> Mel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China's Security : The New Roles of the Military* (Boulder, Colorado :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1998), pp. 9-10

<sup>70</sup> Madhu Bhalla, "China's Security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5, No.2 (1998), pp. 196-197。

<sup>71</sup>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前揭書，頁281-282。

宣告結束，世界局勢的新格局尚未成型，但中共的崛起被美國視為潛在的敵人，中共為突破被遏制的困境，乃提出「新安全觀」，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為核心，基於「和平共處五原則」，以圖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 壹、國際政治新秩序

- 一、**國際社會的民主化**：主權國家平等，世界上所有主權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獨立自主的平等成員，都有權參加國際事務。在國際關係中不得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以富壓貧。國際事務應由世界各國平等參與，協商解決，不能由一兩個或幾個大國壟斷國際事務。中共並不否認大國的作用和影響力，大國由於其本身的地位和條件，在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裁減軍備、促進各國經濟發展、保護人類環境等各方面應當承擔特殊的義務和責任。但決不容許大國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條件來主宰國際事務，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其他國家，損害他國的利益。即不容許任何國家實施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
- 二、**不干涉他國內政**：這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的一項重要原則。必須承認世界各國都有權根據自己國家的情況，選擇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經濟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任何國家，尤其是大國不得干涉他國內政，不可將特定的發展模式強加於他國身上。同時在人權方面，中共認為所謂的人權不儘只是公民的政治權力，而且包括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力。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首先最需要的是獨立權、生存權與發展權。要割斷各國的歷史、脫離各國的國情，不顧及各國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的差異，強要世界各國模仿一個國家或少數幾個國家的人權標準是不恰當的。人權問題是屬於一個國家主權內的事，不容許以人權問題干涉他國內政。
- 三、**相同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國與國之間應當相互尊重，求同存異、平等相待、友好相處。國與國之間的分歧和爭端，應當依據聯合國憲章和相關國際法原則，通過協商和平解決，不得訴諸武力或以武力威脅，反對以軍事力量入侵或戰爭手段來解決國際爭端，任何國家不得以任何藉口侵佔和吞併他國領土。
- 四、**反對軍事同盟及軍備競賽**：各國以獨立自主、不結盟為指導處理相互之間的關係，反對過時的軍事同盟和集團政治模式。因為獨立自主與不結盟比軍事同盟和集團政治更能維護世界和平。軍事同盟和集團政治必然有排他性，它以另外的集團和同盟作為其敵人，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不同的軍事同盟、集團間的對立、衝突，甚至引發戰爭。<sup>72</sup>同時為維護世界和平，主張依據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則，實行有效的裁軍與軍備控制。裁軍問題事關各國安全，應由世界各國共同參與討論和解決。

<sup>72</sup> 曹希岭，〈鄧小平論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指導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山東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3期，頁24。

**五、重視聯合國的功能：**聯合國是一個普遍性的國際組織，「聯合國憲章」內容有關各國之間關係之規定有下列數項：「本組織基於各會員國主權平等之原則」、「各會員國應以和平方法解決其國際爭端」、「各會員國在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本憲章不得認為授權聯合國干涉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sup>73</sup>是故，聯合國在維護世界和平、主持國際正義、推動裁軍進程、促進解決全球發展和環保問題，及在解決國際爭端和地區衝突中應發揮其功能。世界各國應該使聯合國成為討論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論壇，使聯合國在建立和維護國際政治新秩序能發揮更多的作用。

## 貳、國際經濟新秩序

中共認為當今世界發展中國家對於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願望和主張，已涉及到國際經濟關係的各個領域，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sup>74</sup>

- 一、發展中國家有權根據本國國情，獨立自主的發展民族經濟，有權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其它任何國家和國際組織都無權進行限制干涉。各國主權平等，平等參與處理國際經濟事務，實現經濟利益共享。
- 二、各國有權對其擁有的自然資源（如石油等）及開發，有絕對及有效的控制權，並且在所有的經濟活動中擁有永久性的主權。對於跨國公司在本國的經營活動有權進行控制、監督，必要時可以採取收歸國有的措施。
- 三、改變國際貿易條件，改變長期存在的不平等貿易關係，包括對發展中國家出口原料和初級產品，規定一個價格，取消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給予優惠待遇。
- 四、增加向發展中國家資金轉移，放寬國際信用貸款的條件，並改革現存的國際信用貸款的金融制度，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機構的發言權，改變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領域中的無權地位。另外，要求發達國家改善援助條件，並以「免、減、緩」等方式減輕發展中國家的債務負擔。
- 五、發達國家應尊重和照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要求，改革國際經濟結構，改善向發展中國家技術轉移的條件，促進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發展，減少對技術轉移的不合理限制，加快技術轉移的速度。在提供援助時，不應該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以利縮小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技術與經濟方面的差距。
- 六、加強南北對話與合作，在商品、貿易、資金、債務、貨幣、金融等重要國際經濟領域作出必要的調整與改革。
- 七、發展中國家之間要加強經濟技術合作，發展區域性經濟合作，促進集團自力

<sup>73</sup> 周煦，《聯合國與國際政治》（台北：黎明文化，民國 82 年 6 月），頁 316、317、327—330。

<sup>74</sup> 何俊林，〈以平等互利原則為基礎，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甘肅社會科學》，1996 年第 3 期，頁 27。

更生。

八、幫助落後國家克服經濟困難，促進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

綜合上述，發展中國家所提出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目標為：改變以不合理國際分工為基礎的國際生產體系，打破發達國家對國際貿易、貨幣金融領域的壟斷，擺脫國際壟斷資本的剝削和控制，實現經濟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建立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國際經濟關係。

中共自認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自許與全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各國際主義的原則出發，為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作出努力。中共主張改革舊有的國際經濟關係，建立主權平等、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等價交換的國際經濟新秩序，推動經濟共同發展。現以中共前外交部部長錢其琛在 1991 年 9 月 25 日在第 46 屆聯合國大會以標題為「建立和平穩定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的演說，<sup>75</sup>來說明中共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內容。其演說內容要點如下：（一）各國有權選擇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制度、經濟模式和發展道路。（二）各國有權對本國資源及其開發實行有效控制。（三）各國都有權參與處理國際經濟事務。（四）發達國家應尊重和照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需要，在提供援助時不應該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五）加強南北對話與合作，在商品、貿易、資金、債務、貨幣、金融等重要國際經濟領域作出必要的調整與改革。

中共自認關於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主張，符合公正、合理，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並且與共主張的新安全觀核心「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相符。

### 參、國際新秩序的戰略意涵

近代中國的積弱不振的原因，大陸學者認為「近代中國，因為落後，所以挨打；因為不斷挨打，所以更落後。這是一個惡性循環。」<sup>76</sup>要制止這個惡性循環的最佳策略，一方面力圖壯大自己不被侵凌，另一方面進行牽制使強權逐漸衰弱。冷戰結束以後，國際局勢發生變化，權力經過重新分配，中共一個崛起的大國，高喊著「反霸」就是這個雙管齊下的策略。所以「新安全觀」在反霸的歷史背景下形成，主要圖謀經濟發展所需的和平穩定安全的環境，俾能大幅提升其國力，則其顯現的戰略意涵為反霸，而隱性的戰略意涵為爭霸。故新安全觀的戰略意涵可區分反霸及爭霸兩方面闡述。

#### 一、反霸：打破一超獨霸格局

蘇聯的崩解宣告冷戰時代的結束，世界僅剩下美國一個超級強國，美國為維持獨霸的地位，使原先聯中（共）制蘇的友好關係，因中共的崛起及雙方的政治

<sup>75</sup> 《人民日報》，1991 年 9 月 26 日，版 7。

<sup>76</sup> 尹慶耀，〈「六四」以後的中共外交〉，收錄《中國大陸研究》，張煥卿、段家鋒、周玉山主編（台北：三民書局，民國 80 年 12 月），頁 202。



制度與意識形態不同，使得雙方關係逐漸變化，自 90 年代初期，雙方進入一個摩擦多於諒解、緊張多於緩和、競爭多於合作的新時代。<sup>77</sup>

美國為冷戰後唯一對世界局勢具有舉足輕重影響力的「霸權」，故很難容忍任何國家在任何區域爭霸，進而挑戰美國獨霸的地位。當今世界公認的強權除美國外，還有俄羅斯、歐盟、日本及中共，俄羅斯在西方和平演變下，已逐漸接受西方的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且要解決嚴重的經濟問題，短時期內無力和美國一爭長短；歐盟及日本雖在經貿上與美國有爭議與摩擦，但彼此雙方有長期合作的默契，在許多國際事務上大部分仍會捐棄成見支持美國；剩下中共被美國視為一個最棘手、最頑劣與最危險的挑戰者，原因為：一是中共視美國及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為嚴重的威脅，強調在國情、文化不同下，西方的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不見得適合中國，中國要走自己的路，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二是中共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及軍事的現代化取得相當的成效，而美國的綜合國力逐漸下滑，中國已成為美國不可忽視的對手。三是中共對國際事務的看法有其定見，未必追隨著美國，有時反而利用其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及其他外交手段，對美國進行牽制。基於上述理由，前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曾說「美國雖追求與中國積極性交往，來解決兩國歧見，但絕不猶豫採取必要行動來保護美國利益。」<sup>78</sup>

由於美國要將其民主制度及自由、人權等價值觀建構在世界的新秩序中，對中共形成威脅，若中共不予以反制，將危及其政權的生存與經濟的發展，所以從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共的外交政策明顯擺脫美國所建構的框架，美國毋庸置疑已成為對中共構成現實與潛在威脅的最大假想敵。<sup>79</sup>所以從中共新安全觀內容分析，是有制約美國的戰略意涵，具有下列作用：

#### （一）促進世界往多極化發展

由於美國對中共崛起的防範心理，在亞太地區加強雙邊軍事同盟以保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優勢，發展多邊安全合作以約束中共的安全行動。中共的周邊國家也對他懷有戒心，且不排除美國介入亞太地區的政局，因此更加惡化了中共的區域地緣政治狀況。<sup>80</sup>中共近年來在國際上大力鼓吹世界多極化理論，亟謀藉此世界權力均衡之格局，爭取到有利其發展之外部環境，並以在各大國間從中縱橫捭闔，進而有效地制約美國的霸權主義。

#### （二）聯合統一陣線在對美外交工作上取得有利地位

中共新安全觀以「和平共處五原則」為基礎，主張各國有權根據本身歷史條件、政治制度、發展水平、文化傳統、價值觀念選擇自己國家的發展戰略。

<sup>77</sup> 吳國光，〈論後冷戰時代的中美關係〉，收錄《中國前途與兩岸關係》，陳一諮編（台北：風雲論壇，民國 86 年 6 月），頁 266—267。

<sup>78</sup> 前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在 1996 年 5 月在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演講內容。<http://www.foreignrelations.org>

<sup>79</sup> 張雅君，〈中共對美國的戰略思維與行動：圍堵與反圍堵〉，《中國大陸研究》，40 卷 5 期（民國 86 年 5 月），頁 20。

<sup>80</sup> 宋偉，〈中國崛起與英美崛起的地緣政治比較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02 年第 6 期（2002 年 6 月），頁 34。

在國際社會中絕不容許某國強制干涉另一個國家內政問題，甚至以武力威脅。世界各國應在平等互利的條件下把焦點關注在經濟與科技的合作議題，而非軍備競賽。藉此喚起國際社會面對霸權行爲不可姑息，否則世界便無寧日的共識，以爭取世界各國，特別是亞太國家的支持，形成統一陣線反制美國霸權的目的。

### (三) 反制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

中共新安全觀下要建立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主要爲內容爲：一、每個國家都有權根據本國情選擇自己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二、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必須嚴格遵守不干涉它國內政的原則；三、國家之間應當想互尊重，求同存異，和睦相處，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四、國際爭端應通過和平方式合理解決，而不應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五、各國不分大小、強弱都有權平等參與協商解決世界事務。其目的希望能嚇阻西方推動的「和平演變」與「新干涉主義」(Neo-Interventionism)策略，以便維持其外交政策的獨立自主性。<sup>81</sup>其核心內容就是反對以資本主義制度和文化作爲世界統一的價值觀；反對在國際關係中奉行實力原則，提倡遵守平等原則，支持承擔國際責任及進行國際合作，主張和平解決國家間的爭端，通過對話協商、相互瞭解和信任，以多邊、雙邊協調合作解決彼此間的矛盾，使得中共變成一個負責任的大國。<sup>82</sup>而中國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一樣可以負擔世界責任。

## 二、爭霸：冷戰後國際地位的重新定位

鄧小平多次強調：「中國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永不稱霸。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sup>83</sup>江澤民也不斷提出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不對外擴張的保障。中共所以不稱霸的理由一般的解釋爲（一）中共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一個長期和平的國際環境特別是良好的周邊環境。（二）中國曾經長期遭受到列強侵略、壓迫和欺凌，永遠不會把這種痛苦加諸他人。（三）反霸是中共的歷史使命，也是戰略目標，中共不會高喊反霸卻自己稱霸。（四）中共自許成爲維持世界和平和地區穩定的堅定力量。

但冷戰後中共卻將自己定位爲世界大國，1991年鄧小平就曾說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不長的時間將會成爲一個經濟大國，現在已經是一個政治大國了。」<sup>84</sup>1998年中共的國防白皮書也提到「中國是負責任的大國，是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的一支堅定力量。」<sup>85</sup>中共有這樣的認知主要是根據以下事項：（1）在聯合國的安理會是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對部分發展中國家有一定的影響力；（2）在軍事實力上擁有核子武器，且常規兵力也不可忽視；（3）在經濟上雖然平均量很低，

<sup>81</sup> 蔡東杰，〈中共「大國外交」的實踐及其對台灣之影響〉，我國外交在全球化趨勢下的危機與轉機學術研討會，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主辦，2003年10月3日。

<sup>82</sup> 李寶俊，〈冷戰後中國外交新戰略與中西關係的走向〉，鄭宇碩編，《邁進廿一世紀的中國外交回顧與前瞻》（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1年），頁39。

<sup>83</sup> 《鄧小平文選第3卷》，前揭書，頁383。

<sup>84</sup> 陳子明、王軍濤主編，《解除中國危機》（台北：三友圖書代理發行，民國85年6月），頁202。

<sup>85</sup> 〈中國的國防〉，《人民日報》，1998年7月26日，版1。

但在總量上卻名列前茅。<sup>86</sup>因此，大陸學者陳岳認為後冷戰中國國際地位應定位「中國目前還不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全球性大國，在本質上仍然屬於地區性大國；然而，中國又不是一個純粹的地區性大國，它具有十分明顯的全球化色彩，是一個具有準全球性大國地位的地區性大國。」<sup>87</sup>由此顯示中共爭霸的意味已顯露。所以由新安全觀下所欲建立的國際新秩序內容分析，中共是有爭霸之戰略意圖。其表現在

#### （一）發展多極格局牽制美國

後冷戰時期沒有一個大國可單獨制衡美國，但目前歐盟、俄羅斯、日本及中共力量的增長朝不利於美國的方向發展，使美國有時不得不承認當前世界是「多強並存」的事實。而綜合國力強弱決定了國家的國際地位，中共必須要全力發展經濟，才能促使世界加速走向多極化格局。因此，中共呼籲建立國際新秩序，一方面可牽制美國，同時也可藉第三世界國家牽制其他大國的發展，有利中共的綜合國力追上發達國家水準。

#### （二）排擠美國在亞太的勢力

中共認為長期以來，在政治、經濟、文化，甚至價值觀上都形成了一種以西方為中心和西方優越感的不平等的國際秩序。<sup>88</sup>中共的國際新秩序就是要打破這種體系，並建立一種根植於東方傳統文明的「新亞洲主義」，因為中共的價值觀念是排西方的，且從政治經濟利益結構上重建亞洲的主導性。<sup>89</sup>中共組建「博鰲亞洲論壇」(BAF)是以「亞洲人談亞洲事」來對抗以「美國價值」的美式經濟戰略。博鰲既然標榜是「亞洲論壇」，美國當然就無從主導，在全球化經貿爭鋒的發展浪潮，中共欲躋身亞洲經濟新霸主的意圖，清晰可見。<sup>90</sup>

#### （三）伺機尋求成為區域霸權及全球霸權

一個國家擁有的力量及這種力量與外部世界的相對關係是其國際行為的基礎。<sup>91</sup>冷戰時代國家力量取決於軍事力，後冷戰則取決於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的綜合國力。中共對此有相當的認知，故共對「大國」下定義為「大國是指在綜合國力上具有強大的實力……。」<sup>92</sup>中共倡導新安全觀，建立國際新秩序，其目的就是爭取有利環境，加速經濟建設，蓄積綜合國力，使他在未來尋求成為地區性霸權，甚至全球性霸權時有強有力的支撐

前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在「籲世界更了解中國」的講話中指出：「中國大陸

<sup>86</sup> 陳子明、王軍濤主編，前揭書，頁 202。

<sup>87</sup> 陳岳，〈冷戰後中國國際地位的確定和反思〉，收錄《世紀之交的中國世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66。

<sup>88</sup> 同上註，頁 167。

<sup>89</sup> 由冀，〈回應冷戰後時代的挑戰－中國亞太外交戰略〉，收錄《後冷戰時期亞太集體安全》，（台北：業強出版社，民國 85 年 12 月），頁 263。

<sup>90</sup> 王銘義，〈博鰲論壇崛起，抗衡 APEO〉，《中國時報》，民國 92 年 11 月 2 日，版 A13。

<sup>91</sup> 陳子明、王軍濤主編，前揭書，頁 199。

<sup>92</sup> 陳岳，前揭文，頁 160。

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必須與其國際地位、聲望相符。」<sup>93</sup>從此可檢視中共的新安全觀，在戰略上具有反霸及爭霸的雙重意涵。在反霸方面中共將持續高舉反霸標誌建立國際新秩序，以達制約美國及西方大國的目的，以爭取綜合國力的提升，且軍事實力已可抗衡美國時，則將尋求成為區域霸權，甚至是全球霸權，恢復中國歷史上的傳統地位。

---

<sup>93</sup> 于有慧，前揭文，頁 48。